让红色戏剧文化为思政育人赋能

□ 范绪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走进历史深处，人们会发现，“宣言”“宣传”“播种”都离不开一个重要载体——红色戏剧。在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中，红军在行军打仗间隙演出活报剧和街头剧，《我当红军去》《北上抗日》《破草鞋》《扩大红军》《亡国恨》《宁死不屈》等深受战士和群众欢迎。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记述，“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回望百年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戏剧艺术对宣传革命、发动群众、鼓舞斗志、凝聚力量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在各个历史时期，大量以革命文化为题材的剧作，形成了富有特色、别具风骨的红色戏剧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戏剧既是大众化的文艺样式，也是珍贵的党史记忆，融政治性、人民性、历史性、艺术性于一体，富含思想价值和教育价值。推动红色戏剧文化转化为新时代的精神力量和教育资源，为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学校育人注入活力、赋能增效，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题中之义，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的现实需要。

以史实为根脉，在历史场景中夯实为党育人底气。红色戏剧文化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历史真实性。从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戏剧运动，到延安时期的秧歌剧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题材戏剧创作，红色戏剧文化始终与党的历史同频共振。一代代红色剧目以生动可感的人物和情节，记录重大历史事件、铭记革命英雄、镌刻伟大精神，以艺术方式凝固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历程。从《白毛女》到《党的女儿》再到《从湘江到遵义》，一代代红色戏剧以艺术方式凝聚民族集体记忆，为青年理解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提供了历史注脚。其次，红色戏剧史料亟须整理发掘。当前，革命年代的戏剧文献、剧本手稿、演出档案、口述史料等随时间推移大量散佚，部分早期作品已难以复原全貌，抢救性整理和数字化保护刻不容缓。要开展全国性红色戏剧史料普查，实施抢救工程，组织专门力量对革命年代的剧本手稿、演出档案、报刊评论、口述回忆等进行全面征集、系统整理和数字化保护，建立分级分类、开放共享的红色戏剧文献数据库，系统梳理各历史时期红色戏剧文化的创作脉络和精神谱系。此外，还要统筹宣传、文化、教育、档案等部门力量，打通史料征集、整理、研究、转化的全链条，形成收集、整理、考辨、数字化、开放共享的完整链条。唯有如此，才能让史料成为育人的第一手资料，为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留住活的记忆，使红色戏剧文化育人建立在坚实的历史根基之上。

以形象为载体，在具象呈现中增强教育感染力。戏剧融文学、表演、音乐、美术、舞蹈于一体，是全感官参与的综合艺术形式。红色戏剧文化的育人机制，与传统思政课堂以概念演绎为主的教学路径不同。首先，这是一条情境化的道路，将宏大的革命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人物命运与可触摸的生活场景，使学生以“在场者”的身份走近历史，面对具体的人物处境与价值抉择，从而获得可感受、可理解、可认同的生命经验。其次，通过具象叙事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看得见”的图景。学生观剧之外，演剧的体验更为深切：背台词考验记忆与理解，练发声考验音准与情感，做动作考验形体与控制，走调度考验反应与协作。正是在这种多感官、多能力的协同训练中，学生对照革命先辈的人格风骨，有助于自觉摒弃浮躁功利的心态，逐步涵养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甘于奉献、攻坚克难的优良品质。最后，在红色文本的课堂改编中，学生要将课本中的革命事迹转化为可演的台词、可做的动作、可感的表情。这一转化过程本身，就是对历史情境的深度理解。学生从文本改编中获得的感动，在亲身参与的场景排演中转化为切身体认，在反复沟通打磨中沉淀为稳定的价值认同。这种综合性育人载体，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实现德育、智育、美育的融会贯通，让学生在欣赏美、体验美、创造美的过程中接受精神洗礼、涵养道德情操。

以共情为纽带，在情感共鸣中提升育人育心温度。红色戏剧文化所回答的时代课题并非抽象的学术命题，而是千千万万人真实面对的生活境遇和对美好未来的真切期盼。首先，红色戏剧文化之所以能够为思政育人赋能增效，根本在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课堂的认知方式和情感路径，能够把思想政治教育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化被动为主动，实现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实践过程中，一句台词的语气、一个身段的拿捏，都需要反复揣摩、不断调整，而正是在这种反复打磨的过程中，学生对人物精神的理解逐渐从模糊走向清晰、从表面走向深入。其次，重在找到理论关切与学生关切的交汇点，使学生在故事中真正感受到理论对自身处境的深切回应。红色戏剧角色代入所产生的情感经验不会随着情境式教学实践的结束而消失，而是沉淀为受教育者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在其未来面对类似价值抉择时被快速激活。这种“学、演、悟、行”一体化的育人路径，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式。最后，要把握情感的表达分寸。真正有力量的故事，往往不靠浓烈的情绪渲染取胜，而贵在真挚、自然、克制。要相信事实本身的力量，给受众留下理解和体会的空间，使情感在真实叙事中自然抵达人心。

以道理为旨归，在学理阐释中彰显思政引领力。红色戏剧文化是“两个结合”在文艺领域的生动实践。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人民立场，弘扬集体主义和历史进步观，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戏曲、说唱、民间文艺的丰厚土壤，充分吸收民间叙事、传统伦理等本土艺术养分，在审美上体现了“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美学精神。正是在“两个结合”中，红色戏剧文化实现了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为此，首先要围绕新时代红色戏剧文化的创新实践，紧扣时代主题和青少年认知特点，系统遴选、整理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戏剧文化作品和育人案例，分级分类建设覆盖大中小学的典型案例库，既要有高校的深度探索，也要有中小学的鲜活实践，形成上下贯通、相互衔接的案例体系。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伟大精神谱系转化为鲜活的教学素材，形成覆盖各学段、贯通各主题的优质资源图谱，实现一体化供给和精准化推送。其次要发挥国家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组织戏剧教育专家、思政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协同攻关，推出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戏剧文化教学资源，推动红色戏剧案例进课堂、进基地、进云端，让优质资源直达师生、直抵人心。最后要把红色戏剧文化真正纳入思政课和学校美育的课程体系，使其成为常设课程而非临时活动。加快制定覆盖大中小学的戏剧教育教学标准，明确不同学段的教学目标、内容要求和评价方式。将红色戏剧文化融入学校美育和思政教育整体布局，研究制定红色戏剧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教学标准和课程规范，推动红色戏剧文化课程化、体系化、常态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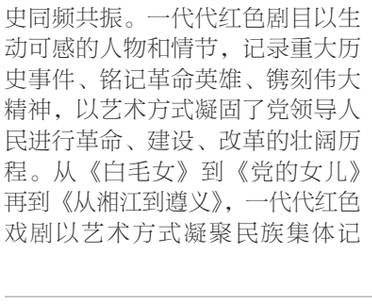
红色戏剧文化承载着党的光辉历史，凝结着人民的精神情感，是红色资源最鲜活、最具感染力的表达形态之一。我们相信，当舞台上的长征精神照进教室里的青春心灵，当革命先辈的生命事迹与当代青年的成长追求相遇，戏剧文化的魅力便转化为红色资源的教育力量。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

大学书记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君子喻于义

□ 叶文举



“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君子的重要素养之一。《论语·里仁》提出“君子喻于义”，朱熹云，“喻，犹晓也”，“喻”就是知道、明白的意思；《释名》曰，“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简而言之，“义”就是事理。所谓“君子喻于义”，大意是说，君子知晓的是事理，它是君子立身行事的重要方式，“行而宜之之谓义”，主要有以下意旨。

“以义为本”。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同‘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二程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义为本。”君子能够以义为原则和根本，不能“言不及义，好行小慧”，不说没有道理的话，不会故意卖弄小聪明。反之，如果“言不及义，则放辟邪侈之心滋”，容易走向歪路。对于君子而言，“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这是时时要警惕的。君子只有“徙义”，惟义是从，才能“崇德”，不断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正如朱熹所言，“徙义，则日新”。孔子在面对弟子子张所认为士人“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谓显达的误解时，反驳道，“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认为真正的君子显达是其品性淳正，行事合乎义理，“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否则就是沽名钓誉。君子“好义，则事合宜”，如果是国家管理者，则“其使民也义”，调动百姓不会随心所欲，治理事务自然就会合乎政理，“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春秋时期的子产就是“以义为本”执政的君子典范。

“见义勇为”。凡是符合事理的事情，君子应敢于去做，要有担当感。孔子曾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可以之意）也，无莫（不可之意）也，义之与比（从也，听从之意）。”在孔子看来，治理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一定要如何做，或不怎样做，但只要合理恰当，就要敢于去行事，君子要“行义以达其道”。“见义不为”则是“无勇也”，这不是君子的作风。故而，君子勇为不是无原则的，只有合乎正义的事情才要勇于去做，这就是“铁肩担道义”。子路曾向老师孔子提出：“君子尚勇乎？”所谓“尚”，是“上之也”的意思，子路疑惑君子是以勇敢为上吗？孔子则明确表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如果只有勇，没有义做保障，最终会流向作乱的境地。括而言之，没有义，仅有勇，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无理性的状态。子路“性鄙，好勇力”，偶尔会逞匹夫之勇，孔子言外之意是提醒子路不要做无义之勇。“义以为尚，则其勇也大矣”，人只有以义做支撑，行事合理，其勇就不会变成莽夫之勇，才能成为“勇者不惧”的君子。故而，“见义勇为”是为了做出合理的事情而表现出的社会担当，应该加以鼓励和表彰。正因如此，在“大义”面前，君子要勇于承担，甚至可以“舍生而取义”，屈原、苏武、文天祥等就是“舍生取义”的勇为君子。

“见利思义”。人生活在社会需要有物质的保障，自然就会有利益的存在，“利者，众人所同欲”。不过，对于利益，君子“富而可求”的方式是要合乎义，出于公心，取之有道，“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在提出“君子喻于义”后，接着又说“小人喻于利”，显然是两种行事方式的相对言说。和君子迥异的是，“小人”一味逐利，甚至可以说为了私利，不择手段，利本而义末，违背规则。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也”，舍义而逐利，有悖道德伦理，一切以逐利为目的，其极端的可能就是道德底线的丧失。“义利之辨”一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对于君子而言，义利之间，“义”是第一位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正当得来的利益是君子竭力要舍弃的，否则难以心安理得。“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在利益面前奉义行事，“士穷不失义”，尽管物质上有所匮乏，但在内心上才能真正做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感受到人生坦荡如砥的愉悦。进而言之，君子能够抵御不正当的利益诱惑，故而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境界。孔子云，“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孔子认为成人（全人之意，就是完美之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见利思义。“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是“九思”之一，君子看到有利可图时，要考虑利益是否为正当所得，这样才不会陷进物质诱惑的泥潭。

“君子喻于义”在当下仍有不可或缺的文化意义和践行价值，它启示我们，任何行为都要合乎事理，要走正道；遇到合乎道义的事情，要有敢于承担、勇于行动的责任感；在利益面前，不能一切都“放于利而行”，无原则地为获取利益而肆意妄为，贪污受贿、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等都不是正当行为，物质财富的获得切勿违背社会正义和法律的准则，要取之有道。

我看君子文化

（上接1版）

《决定》通篇贯穿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精髓和实践要求。《决定》在研究制定过程中，把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形成的管党治党方针原则、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落实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思路举措上，体现在文件框架安排、总结成就和经验、分析形势和任务等各个方面。从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议题的精心选择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定为全会议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就拎起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主纲和主线。“持之以恒”，既表明了对这个战略方针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又表明了在新征程管党治党中确立新起点、解决新问题的鲜明态度。

从框架安排和工作布局看，《决定》全文分三大板块，形成“总论+分论+保障”的结构，这与习近平党建思想“总论+分论+保障”的结构在形式风格上保持一致。《决定》的总论部分，既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重大判断、重要论断、重要观点一脉相承，又结合新的实践提出新的理论增长点、实践创新点。比如，提出“两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永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册”，深化了我们党对“两个答案”历史性贡献的认识；对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取得的成就，从八个方面作出全面科学总结，指出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阐述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有助于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意志、接续奋斗。《决定》的分论部分，对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坚定不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作出战略部署，这些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科学内涵所涉及和涵盖的重要内容，同时又紧密结合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在原有成果基础上分析新情况、提出新思路、明确新举措，使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丰富，展现出这一开放理论体系的巨大魅力。

从方法路径看，《决定》充分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方法，坚持使命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抓住关键要害、聚焦突出问题，坚持治建并举、以治促建，对管党治党面临的矛盾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包括关于形势任务的“三个更加艰巨”与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这“四大挑战”等科学结论；坚持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在压紧各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的基础上，提出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等新要求，在激活党组织的“细胞功能”上形成新思路；坚持行使权力与担当责任相统一，提出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建立重点行业权力清单、基层小微权力清单，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等新要求。这些重要举措对于增强管党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中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个主线

拥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各方面全过程。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看，这一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点，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无论是对治党强党还是治国强国，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维度看，这一思想为指导全党思考和把握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供了行动指南。从以强党引领强国维度看，这一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与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更加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提供了行动指南。

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决定》是集中全党智慧、体现全党意志的纲领性文件，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重大任务、重大举措作出部署。《决定》的制定形成离不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引领，贯彻落实《决定》同样离不开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理解得越深刻、把握得越到位，对《决定》的鲜明主题、思想脉络和实践要求就会领悟得越准确、贯彻得越有效。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原原本本学、持续跟进学，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集体学习、集中培训的重点内容，做到常学常修、常学常新，同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思路、完善举措、健全制度，不断提高管党治党和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坚持鲜明问题导向。鲜明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重要理论品格。从《决定》的谋篇布局看，通篇坚持问题导向，是奔着解决党内突出问题而制定的，坚持有什么问题就研究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突出重点、直击要害。比如，从词频表现看，《决定》提及“问题”这个词达到57次，强调破除、纠治、防止、纠正等针对问题的达到90处。从问题表现看，《决定》第二部分“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方面，提出要与“三种不良言行”作斗争、决不允许搞“七个有之”、坚决反对“五个主义”等；第三部分“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提出领导干部“两个不得”、决策议事“三个坚决反对”等；第四部分“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方面，提出精准科学选人用人要做到“两个防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做到“九个整治”等。贯彻全会精神、解决突出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深入一线调研找准问题，同时要强化斗争精神，不回避矛盾，做到对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病根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不达目的不罢休，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不断巩固解决问题的成效。

用好制度治党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决定》既在指导原则中把“坚持依规治党”作为七个原则之一突出出来，又在主体部分第八章专章就“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出部署，凸显了制度治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保障作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注重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执行力，大力破除潜规则，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工作效能。

强化责任担当。“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只有形成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整体合力，推动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才能确保党的建设的高质量。落实全会精神，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局外人、没有旁观者，要下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得力、制度执行不严格等问题，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和工作摆进去，明确努力方向，校准行动标尺，强化责任担当。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抓、用心管，做到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特别是担起政治生态的治理责任，立明规矩、破潜规则，以正压邪、激浊扬清，通过营造一个个良好小环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大气候巩固发展。各级“关键少数”特别是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要把监督责任、“一岗双责”、行业主管责任等抓实，推动党员、干部结合岗位实际落实具体责任，不断强健管党治党的责任链条，以责任到位推动管党治党任务落实到位。

（执笔：汤俊峰）